

新學習和調整知識結構的過程，這又同緊張的研究在時間上有衝突，要在具體安排上有所協調。

這些意見，是創辦發展組這群人初始想法的集中體現，當中也有他個人的一些思考和傾向性的意見。講這一點，主要是要說明他在籌備階段是重要的一員。

同時，在他的影響下，當時北京經濟學院的一大批學生積極地參加了發展組早中期的活動，其中有王文仲、李慶增、趙明宇、戴小京等等。發展組早期的活動籌劃江北辰都參與，很積極，他是當時領導小組的成員。1982年以後，由於個人的一些原因，和陳一諮發生了衝突，參與發展組的活動就逐漸減少，到1983年後就逐步離開了發展組。這之後，他跟發展組的一些主要成員交往也就越來越少，後來基本上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他的去向也不清楚，或許他到別的地方去發揮他的才能了。後期參加農村發展組的一些成員對江北辰的情況都不太知道，但他確實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早期比較重要的一員。

鄧英淘

鄧英淘，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創始人之一，當時他是北大經濟系的學生。文化革命以前他就學於北京景山學校，文化革命期間上山下鄉，先是在山西，後經羅小朋介紹於1971年與陳一諮相識，有了溝通和交往，陳一諮把他約到河南參觀程莊農業勞動大學，他對陳一諮在那裡所做的事情很感興趣，就從山西的知青點轉到河南。他在河南農村邊勞動，邊當農業勞動大學的教員，既是學習，也是一種探索。讀了大量的書，包括系統地讀了《資本論》。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他很順利地考上了北大經濟系，在上學的階段就更系統地完善了他的經濟方面的理論知識。並讀完了北大數學系三年半的課程，看了大量國外介紹過來的各種經濟學理論、方法論的書，

同時關注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狀況。

他跟陳一諮在 70 年代相識，並且在一起奮鬥過。所以當陳一諮提出要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來研究農村問題，研究農村的改革，研究農村的發展，他不僅是最早的呼應者，也是那個階段的重要參與者。應該說是參與策劃、參與創建農村發展組非常重要的一員。鄧英淘在研究過程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非常重視科學技術方面的新成果，他是最早倡導運用多學科知識



鄧英淘

和方法來研究農村問題的人。他對數學有特殊偏好，喜歡用模型說話，他當時經常說，一個經濟問題最後不能還原到用數學的方式來證明，這個經濟問題就可能存在虛假性。

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在討論中往往能抓住最重要的問題和環節，不是喋喋不休，而是一下就抓住問題的要害，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的關節點。他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總能感到有一種氣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你對他那種很直接地提出問題的方式感到敬佩。他寫東西成文之後，一般改動都不多，層次清楚、邏輯關係清楚、條理清楚，不說廢話。他經常在內部討論的時候說，寫東西一定要有「乾貨」，而不是「片湯」。他對研究工作很認真、很嚴肅，平時他比較隨意，但是遇到他認為比較重要、比較關鍵的問題時，就會採取一種非常嚴肅、非常認真的態度來對待，在觀點上從來不敷衍、不含糊，很直接地亮出自己的意見。

陳一諮在議論他的時候說：「一般的人要麼是有我無他，要麼是有他無我，而鄧英淘是無我無他。」所謂無我無他，就是只認一個「理」。他可以否定自己，也可以否定別人，否定的時候都採取一種很明確決斷的態度。他認定的東西，在你拿

出讓他信服的證據來否定之前，他不會輕易動搖。但是一旦你能用更有力的東西來證明這個觀點的正確性，證明得比他好，他會毫不猶豫的接受你的意見。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他提出的觀點通常都經過周密論證，所以你論證的方法一定要比他使用的方法更先進、更嚴密、更有力，依據更有說服力，這談何容易。

在發展組中，他比較關注多樣性，比如大家都集中精力調查包產到戶的形式及這個形式的普遍性時，他會蹲點去調查不搞包產到戶、堅持集體經濟的類型。他要搞清楚為什麼。我們當年在滁縣調查時，他有意識的調查一個大隊堅持集體的 mode，他得出結論說，像這樣的情況必須有一個好的當家人，相互之間的關係有一定家長制的因素，這個人一定要非常精明、公正。事實證明，多樣性比單一性、一刀切好，普遍性絕不排斥特殊性。採取什麼形式，關鍵是農民自願。在中國，由於地域條件、歷史條件以及各種鉅大差異因素的影響，肯定會有比較普遍的形式，在這些普遍形式中也有一些特殊形式。對於這些特殊形式存在的原因，它的內在合理性，他予以關注。包括後來對河南的南街、江蘇華西村等這樣一些點他都做過研究。

鄧英淘為人很直率，很有大俠風度，但是他的這種直率裡包含一種智慧，他幾乎關注當今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只要這個問題具有戰略性，有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他比較喜歡跟高智商的人打交道。他敢於挑戰自己，也敢於挑戰所有人，跟他討論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感覺到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勢。但多次交往之後，就會感覺到他的這個咄咄逼人，並不是優越感，而是有一種真理在手的氣勢。發展組裡大家都知道他是鄧力群的兒子，但是他從來不會主動提起。有些人可能同他相處了一兩年之後都不會知道他和鄧力群的關係，而是靠第三人介紹才知道他們之間關係的。他比較崇尚靠自己的能力、膽識、學識來從事自己的事業，而不是靠家庭關係、長輩的影響力來促進自己的事業。

但他對父輩的事業，不管是對還是錯，他都懷著一種尊重

和敬仰的態度。他尊重的是一代人的努力，他對他們的很多行為過失都持批評態度，但是他的批判，是希望這個事物的存在過程、發展過程能更好。他在發展組時，如果有必要，會把一些事情做得很細，但他更看重一些戰略性、有影響力的問題。在農村發展組的這個範圍內，他是一個學貫中西的大才，就我來看，他的學問、學識、才幹等等由於種種原因，都沒有得到充分的施展。

在發展組，和大家一樣，他既是參與者，但很多時候他承擔了教員的工作，他以講座的形式給大家講述了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知識，並且他的講座很精彩，能準確的抓住知識和觀點的精華所在，把高等數學轉化成一種比較通俗的語言。當時他和何維凌配合得非常好，就是希望發展組的成員能夠在研究的過程中，有共同的基礎語言，和比較一致的規範。他認為數學語言是最基本的規範語言，因為不同的社會現象、經濟現象，基本的數量關係不會因為不同的人來研究而發生變化。同一個問題你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研究，可能會因為研究人的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價值觀念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但最後由數量關係來體現的時候，不會因人而異，比較精確、比較客觀。鄧英淘當時還在北大經濟系學習，他還是一個學生，同時也是發展組很多人的老師，從1981年到1983年，他給大家上課，而且在那個時候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對技術經濟學、數量經濟學有特殊的興趣。

在發展組的早期，由他主持寫作《論戰略研究》，當時參與的人多，大家一起討論，但是他一直主導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他指出：各國發展的大量史實證明，如果在戰略上發生錯誤，不僅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將給整個國家的戰略地位帶來嚴重的後果。相反，戰略上的正確決策，能給經濟社會產生鉅大的推動，並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不是任何問題都具有戰略意義，戰略問題具有他特定的含義，所謂戰略問題就是關係到全局和整體的主要力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使用方向和如何使用的問題。對一個國家而言，而是主要國力在中長期如何

配置的問題。

他在這篇文章裡論述了基礎研究、戰略研究、應用研究三者之間的關係，論述了戰略研究的程序、方法、含義、約束條件等。在這篇文章裡面，分析了中國在過去 30 年裡戰略選擇上的一些失誤以及所帶來的一些後果，以及其它一些國家同一時期因為戰略選擇的正確而出現很好的發展態勢，實現經濟起飛，實現經濟社會持續性的發展。同時也論述了戰略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條件，他主張戰略問題必須分解為若干相互聯繫的、相對簡單問題，使整個研究有可能進行。戰略研究的內容、特點、性質決定了戰略研究的方式、方法是高層次、多學科、系統化、程序化的，並且需要使用計算機、模擬技術等。這些特點使得從事戰略研究的科研人員必須是具有專長的通才，必須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工程技術方面的訓練，才能在比較廣泛的領域比較自如的有深入的研究合作。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必須不斷的再學習。為了避免科研人員形成凝固的思路、角度，以保持對事物應有的敏感和豐富的想像力，始終站在科學的前沿，不同的戰略研究中心應該互相交換科研人員，並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之間也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人員的交換。他明確的指出說如果沒有戰略研究這個重要的環節，基礎研究就不能對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作用，而應用研究就會具有盲目性，失去方向。他認為戰略研究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一個比較重要的橋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鄧英淘在農村發展組的整個階段，一直是發展組的領導成員，不管是執行小組、領導小組，以至後來的組務會議，他都是重要的成員。他比較長期地在組裡承擔科研、組織和協調工作。他關注具有戰略性、重大影響的問題，他自己對一些問題進行有持續性的研究，如發展組關注的糧食問題，他做糧食課題時最關注的環節是中國的糧食安全，他經常要測算人口增長對中國糧食的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空間。而對一些具體的環節、問題就讓別人去研究，如糧食從生產到交易、市場、相互關係的問題等，當時高小蒙就對這些問題做了很多的研究。而

鄧英洵主要關注糧食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糧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對在研究的過程中其它人提出的大膽設想，都會予以鼓勵。

1982年，當時發展組在江西吉安做調查，吉安臨近廣東，而廣東是中國改革發展起步較早的沿海經濟區，農民已經不願意種糧了，更願意種經濟作物。而江西在這一方面的發展肯定慢於廣東。當時廣東的糧食越來越不能自給，需要從外地大量調糧食。宋國青就提出在廣東和江西之間修高速公路，用奔馳大貨車把江西的糧食運到廣東，進行區域性的交換，將其昇級到戰略的高度。鄧英洵就很欣賞這個意見，將其命名為「奔馳計劃」。他認為在中國實行這種區域性的交換，對經濟發展而言，是革命性的。就是說在包產到戶情況下，市場經濟將有很大發展，必然擴大區際交換，乃至國際交換。他對這些問題有敏感的判斷，是超一流水平的。

很長一段時間，給人的印象，他只關心問題、關心研究、關心成果、關心「乾貨」，所以陳一諮說他「無我無他」，只認一個「理」，一個「道」。其實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1981年過「五一」，當時發展組的外地成員，在北京沒有家人的就是我跟羅小朋，他約我們到他家裡去吃飯。我在北京經歷了比較長的借調時期，他對我的調動問題也是非常關心的，為我的調動問題跟他父親說過很多次，只是當時「戶口指標」實在是太困難的事。應該也是在1981年，當時北大的學生因中國女排第一次拿了世界冠軍而狂歡，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在校園內組織遊行、聚會。他當極其興奮，當時我住在北大，他跟我見面的時候說「中國有希望！」。他是有情有義的人，只是他用自己不同於別人的方式，來表達情誼。

家庭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親情影響，任何人都不否認，應從正面予以肯定。影響歸影響，鄧英洵歷來是比較獨立的，有一段時間他沉迷在數理經濟學上，引起了鄧力群的注意。但鄧力群也不是強調一定要鄧英洵和他的觀點一致。鄧英洵是一個自己對自己負責的人。他當年在山西勞動的時候，比農民還

上勁，當地農民對他的評價就是「他勞動的時候比農民還農民」。而他的家庭卻不是農民。

他是 1951 年出生的，進入發展組，在整個思想上已經很成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在鄧英淘身上表現出的更多是一種獨立思考的習慣。他認定的東西都是經過他自己思考和判斷的，人們評價他的某一個時點的時候，都認為他受家庭的影響比較大，這是錯誤、有偏見的。你要看他的整個思想、意見、觀念形成，作為一個比較長的連續性的過程來看的話，他就是他自己。你拿他今天的觀點來和 30 年前的觀點比較的話，你可能會發現有很大的變化，但一些最基本的點卻沒有變。如果你對他進行連續性的考察，他往前走的每一步，都很自然，前後有很深厚的邏輯關係。他一生都是在研究問題、做學問。在發展組時有一段時間，他似乎跟王小強格格不入，但是現在他們關係又走得非常近。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正常得令人心儀。他們始終在關注中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發展問題。

鄧英淘始終在讀書、在學習、在向前走，如對「再造一個中國」，對中國大的水利治理的意見，對新能源技術，他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和意見。他受到各種現實因素、歷史因素、個人因素影響，是典型的大材小用，可是，你永遠聽不到他的抱怨。

他在 1984 年到 1985 年這段時間，農村發展組在做比較系統的農村改革的系統考察，以及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的專題研究，他是重要的參與者、策劃者。儘管他個人跟陳一諮淵源深厚，陳一諮、王小強確定要離開發展組，去籌備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那一時期他是認定了，中國農村發展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研究透，所以他選擇留在發展組。以後隨發展組一起從社科院轉到農研中心，繼續在農研中心的發展組從事研究。農村發展組改制為發展所之後，他是這個所的主要成員及科研骨幹。直到 1989 年，他又調回社科院，當時社科院的農業經濟研究所也改名為農村發展研究所，他到這個所去任副所長。後來他籌辦了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有時候

感覺鄧英洵在研究問題時有跳躍性，但是最終你會發現他所關心的所有問題都是現實問題。最牽動他心腸、最花他時間和精力的還是水資源、能源這些具有深遠戰略影響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比較感興趣。但是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做大學問的人，在他關注最重要的問題之餘，對其它的一些問題做點品嚐，聊以休養生息。

有些東西不一定是他自己刻意關注的，進入 90 年代以後，他跟南懷瑾交成摯友，忘年交。他到處推薦南懷瑾的一些書給人看。我細細想了一下，他未必對南懷瑾的主要觀點都持贊同意見，但是他肯定讚賞南懷瑾用很大的精力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研究的過程、治學精神很讚賞。因為南懷瑾對「五·四」以來，歷史過程中一些匆匆忙忙否定或作了結論的問題進行了反思。當沉下心來的時候，會有許多別開生面的觀點和意見，你從這個角度看，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只要能夠孜孜不倦的把事情堅持下去，太多的考慮功利和對錯，就有失偏頗了。

鄧英洵自己在研究上非常嚴肅認真，他有時候會把一些細節處理的非常技術化，他提出來的問題始終都是帶有戰略性、全局性的。這對他來講是貫徹始終，從這個角度來看，看不出他有何變化，他變化的只是在不同時期，涉獵同類問題的不同側面。從貫徹始終來講，他是堅持得最好的。在觀點的更新上面，他可能經常在變，變是因為他有了新的認識，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經過他認真的研究，在第三者看來是對是錯，他不會特別在意。如果一個人在研究問題的時候，他首先關心別人的評價，那一開始就不要搞研究。陳一諮說鄧英洵「無我無他」，反過來也可以說，鄧英洵「有我有他」，他有自成一體的觀點，完整的自我；也關注、重視一切他認為不是「片湯」的他人成果。你只要看一看在研究中國水資源問題後，他與「黃委會」、「長委會」那些傑出人物惺惺相惜的交往，你會頓悟：佛說，「無我無他」，神之氣；「有我有他」，人之氣。

我說不清楚，也許鄧英洵是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人，當他身患絕症時，依然從容淡定地研究中國的水資源，中國的新能源這類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問題。

張木生

張木生，是發展組又一個大俠式的人物。初中畢業，受時代潮流的影響，決定不上高中，到農村去插隊。1965年就



張木生

和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兩個人寫了血書，義無反顧地到內蒙去插隊。剛去的時候也是比農民還農民，玩命地幹活，那時候還沒有提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都是自覺的向農民學習。這樣一年幹下來，看看自己的日子，看看農民的日子都不好過。便開始思索，很多宣傳的東西和他所身臨其境的東西，有太大的差距，腦子裡沒有現成答案，只好看書。這一代人大都喜歡文學，喜歡看雜誌，一學習就會學馬列，都希望從馬列那裡找答案。

張木生在開始下鄉不久之後就開始挑燈夜讀，那個期間讀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原著，在讀的同時還做筆記、思考，用經典理論來對照中國的實際，對照生活。他也屬於敢說敢為的人，當他看到經典理論中所說的和現實的情況有差異時，就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觀點和意見。還寫成文章，四處傳播。文化革命時期，因為他組織一些人學馬列，研究中國問題，寫了很多東西，宣傳了很多東西，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他也就受到打擊、衝擊、迫害。

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調到呼和浩特的商校做教員，之後又調到北京，也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最早的成員，參與了發展組的籌備和創建。第一次見張木生時，是在北大專家招